

BAJINZHUAN

徐开垒 著

# 巴金传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巴金传

上海文艺出版社

徐开垒著

责任编辑：李济生

左 泥

封面设计：袁银昌

## 巴 金 传

徐 开 垒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平6精9 字数 246,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16,700册(精)1—6,000册

ISBN 7-5321-0694-2/I·558 定价：(平) 5.20 元

ISBN 7-5321-0695-0/I·559 定价：(精) 8.55 元

登记证号：(沪) 103

# 目 录

## 第一章 四川老家

|     |          |    |
|-----|----------|----|
| 第一节 | 书香门第     | 1  |
| 第二节 | 在慈母的抚爱下  | 6  |
| 第三节 | 经历了一场风波  | 15 |
| 第四节 | 第二个“先生”  | 20 |
| 第五节 | 母亲和二姐的死  | 23 |
| 第六节 | 父亲与大哥    | 28 |
| 第七节 | 从动乱到破灭   | 34 |
| 第八节 | 生活道路上的微光 | 43 |
| 第九节 | 告别成都     | 51 |

## 第二章 巴黎钟声

|     |                |     |
|-----|----------------|-----|
| 第一节 | 离国之前           | 61  |
| 第二节 |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 76  |
| 第三节 | 旅店深夜           | 87  |
| 第四节 | 卢梭像前           | 97  |
| 第五节 | 牺牲在电椅上的“先生”    | 106 |
| 第六节 | 从玛伦河畔到马赛海滨     | 117 |

## 第三章 燃烧的热情与千万颗读者的心

DQ 12/12

|     |         |     |
|-----|---------|-----|
| 第一节 | 返沪以后    | 125 |
| 第二节 | 闽南的朋友们  | 137 |
| 第三节 | 大哥与《激流》 | 144 |
| 第四节 | 炸不掉的心   | 159 |

## 第四章 在鲁迅的旗帜下

|     |             |     |
|-----|-------------|-----|
| 第一节 | 难忘的南北之行     | 170 |
| 第二节 | 和鲁迅的会见      | 184 |
| 第三节 | 横滨的困惑与东京的受难 | 193 |
| 第四节 | 来到编辑的队伍里    | 212 |
| 第五节 | 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 224 |

## 第五章 烽火友情

|     |         |     |
|-----|---------|-----|
| 第一节 | 初秋的号角   | 237 |
| 第二节 | 患难知己    | 247 |
| 第三节 | 颠沛流离的日子 | 261 |
| 第四节 | “孤岛”一年  | 273 |
| 第五节 | 生者与逝者   | 284 |
| 第六节 | 胜利前夜    | 296 |

## 第六章 期待

|     |       |     |
|-----|-------|-----|
| 第一节 | 胜利时刻  | 308 |
| 第二节 | 在上海定居 | 323 |
| 第三节 | 书的因缘  | 337 |
| 第四节 | 长夜已尽  | 345 |
| 后记  |       | 363 |

## 第一章 四川老家

### 第一节 书香门第

历史是很迷人的。如果你有兴趣研究每个家庭的盛衰，你就会觉得它总是和它所处的时代发生着十分微妙的关系。不管这个主人的心态，是顺应历史老人的步伐前进；还是根本不理睬时代的潮流，一意孤行，最终它们仍然还是要与历史携起手来，发生使人无可奈何的变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外有侵略，内有战乱，清代王室摇摇欲坠，无疑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川西平原，人们至今还不曾忘记九十多年前曾有一个端午节，在成都的东较场上，发生过一起震惊中外的“成都教案”，有几千群众把四圣祠街的外国教堂捣毁了；接着而来的，则是红灯教和义和团的暴民们，相继围聚在成都城外，多次向城内作令人胆颤心惊的攻打；然后就在商业繁荣

的成都市中心，有一些读书人，组织起一个由立宪党人控制的“蜀学会”，企图用“通经致用”、“托古改制”的办法，来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尽管这些都象征了时代已不能再是死水一潭的局面，而在成都城的北门，有个座落在正通顺街上的李家，它的主人李镛，却还是按照祖宗世代传下来的规矩，在安排着他自己的家业，虽然他到最后才知道那原来不过是春梦一场。

这条正通顺街是一条石板路，虽有几家店铺，多半却是做官人家的住宅。李家在这条街上，占地面积最广，名声也很响亮。它的西邻是清末驻藏钦差大臣凤荃的住宅，后来租给英国作为领事馆；东面是赵姓公馆，再过去则是一个大仙祠，平时静悄悄，一到逢年过节，举行庙会，香火却很鼎盛，这条街也就热闹起来，甚至行人如织了。西面转弯街角，则有一家茶馆，是三教九流人物逗留的一个热闹场所，公馆里的人是很少在这里出现的，只有隔壁轿行中的那些贩夫走卒，才经常站在茶客旁边，听那些见多识广的人讲来自城内城外的新闻。

李公馆门前平时则是肃静无声，巍巍的高墙把深院大宅内的声音都围起来了。门前一对石狮子，也长年保持着沉默，好象它们也与这家的主人一样，无闻于世界的各种声响。门前还有两只很大的太平缸，经常盛满水，准备附近发生火警时救灾用的，由于多年这里保持着“太平”，这两只太平缸并不曾发挥过作用，倒是附近的那口双眼井，成了这个地段的标志，有时人们就把“双眼井”三个字来代替“正通顺街”这条街名了。

写在李家大门上红底黑字的门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

八个大字，确实反映了主人李鏞对国事家务的看法与愿望。在他心目中，这是个皇恩浩荡、国泰民安的时代，即使社会有些小的动荡，也不过少数盗匪一时作乱，不久总会由官府派出大兵把他们平定的。他从来不曾想到过皇帝有一天也会垮台，连他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家庭也会发生变迁。说实在，从李家的祖基来讲，李鏞不但不是游手好闲的败家子，而且应该算个光采的接班人。他的祖父李介庵先随伯祖李秋门离原籍浙江嘉兴到北京，得交当时名士吴穀人、张船山；后又应聘山西马氏教馆，做了十余年的家庭教师，使马氏子弟都得以应试及第。这样，李介庵才有机会因马氏的保荐，捐官入川，在当地定居。到了李鏞的父亲李璠，他不但做了一任县官，还购置了一些田产；但数量不多，留给后代的，主要还是他那本有些书卷气的《醉墨山房仅存稿》。只有到了李鏞，辞官后才广置田产，还在戊戌政变前，买下正通顺街这座五进三重堂的深院大宅。

李鏞觉得他的家业兴旺，是由于皇恩浩荡，只有按照皇帝定下来的规矩办事，才能这样无愧于祖宗在天之灵。他盼望他的所有后代都按着他的规范兴家立业。他一向认为自己为官清明，深通礼教，特别还能写诗做文，这很使他有点自负；六十岁那年还曾印了一本《秋棠山馆诗钞》送给亲朋。他的原配夫人汤氏，是个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她的外祖母更是当年“兰陵三秀”之一，既能绘画又能作诗，还曾一度以诗画维持生活，自称“澹影阁老人”。所以这位汤夫人，真称得家学渊源，可惜天不假年，较早亡故，只在死后留下一些诗句和画稿。李鏞的第二个夫人姓濮，也是江苏人，门第虽不及汤氏，却也不是一般妇女。她同样能吟诗，并留有诗稿，在李鏞的“诗钞”里

也不难发现她与丈夫相互吟和及寄托哀思之作。两位夫人为李镛生下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一子二女早年夭亡。李镛在前两个夫人谢世后，又讨了两个姨太太，为他带来一个足以做他的孙子的第六个儿子。

由于“书香门第”的传统，李镛夫妇给他们的大儿子李道河，也娶了一个知书识字的闺秀做李公馆的大房媳妇。这个媳妇虽从十岁起就跟着做官的父亲来四川定居，却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的一个县城里，她曾伴着她兄弟进私塾读了几年书，学名陈淑芬。她凭着聪明的天资和良好的素质，居然很早就与诗词结下了不解缘，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让这些诗词艺术陶冶了自己的性情。她为人谦和，品性善良，同情下人，而又豁达大方，深得翁姑亲朋的好评。当她嫁到李家时，公馆曾为这位大房媳妇进门演了三天戏，使整个正通顺街都知道了李家这件喜事，非同一般。果然，她进门第二年，就给她的丈夫李道河生了个面目清秀的男孩，也就是说，给李镛带来了一个足以为他家传宗接代的长房长孙。这就是巴金的大哥，奶名叫果蓏的李尧枚。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李道河的官运并不亨通，快近而立之年，还一直在成都邻近的几个小县城里担任着知县下属的小吏，这使李镛常引以为憾。就在这时，陈淑芬却又为李家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封建家庭重男轻女。女儿太多不免成为伯叔婶娘们讽刺嘲笑的话柄。恰好那一年，李道河被派去当大足县的典史，专管监狱和捕捉盗贼的事情，每晚都要出去巡查，半夜才能回家，虽工作辛苦异常，却讨不了上司的欢心。因为他不善于见风使舵，鉴貌辨色，不久就被别人接替了自己的职位，最后只好回成都老家。这就更使长房在公馆里颜面无光。第二年，李镛花了一笔巨款，给儿子捐了一个

过班知县。按照那时的规矩，捐官需送京城去，让朝廷点派的大臣验看他的风度、相貌和履历，才能确定他是不是能担任这个官职。哪知李道河虽然性情豪爽，平时很受朋友们器重，却并不为上司赏识。大臣才问了他几句话，就把他的申请“驳回”了。他在京城进退两难，处境尴尬，一封家信寄到成都，陈淑芬在李公馆更成了众矢之的。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长房媳进门，许多双眼睛就瞧着她有没有“帮夫运”。李道河在京城申请“过班知县”被驳回，罪名不在上司的用人唯亲，也不怪李道河自己，而是在他的夫人缺乏好运帮夫。至少公婆、叔婶、妯娌是这样看待的。她由此受到揶揄，日子很不好过，只有对着她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暗暗掉泪。不久，火上添油，她那还不到四岁的大女儿，竟在她心神不宁的烦忧生活中夭折了。

李道河的第二个儿子尧林，和第三个儿子尧棠来到人间，真是及时。他们不仅给在大家庭中受困的母亲解了围，而且那时新世纪的曙光已在中华土地上出现：清朝皇帝想用“新政”来挽回王朝即将崩溃的危局，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尧棠出生的那天是1904年11月25日，即农历甲辰年十月十九日，正是他母亲陈淑芬自己的生日。这一天天气晴朗，象每个有阳光的冬日那样，叫人感到温暖又愉快。早晨，陈淑芬躺在床上，在朦胧中，想起黎明前那个奇怪的梦，禁不住嘴角挂上微笑。她记得醒来之前，有个观音模样的“送子娘娘”踏着轻盈的脚步，来到她的面前，微笑着将个婴儿交到她的手中，对她说：“这孩子本来给你弟妇的，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给你。”她把孩子揣在怀里，抬起头向娘娘道了声谢

谢，然后低下头去看那婴儿，自己却醒来了……她像往常一样起了身，吃过早饭，从女仆袁嫂手里抱过来才断奶不久的一周岁多的尧林(奶名安馨)，看她是不是把他喂饱了；然后来到三个大孩子尧枚、尧桢、尧彩身边，让他们围着她说笑。就在这个时候，她发觉自己的腹部出现阵痛，多次的经验告诉她：可能临产了。于是象所有当年做官人家一样，家里出现了忙乱：她被搀扶着重新睡到床上去，李道河赶紧派轿子去请医生，李镛则按着旧规点燃起香烛，求祖宗在冥冥中保佑全家安宁；接着是整个公馆里的人都在关心：长房里添丁还是弄瓦？

暖暖的阳光照在上房的窗前，它的脚步虽然缓慢，却并不停顿。时间已经过午了，好不容易，房间里终于响起一阵婴儿的响亮啼声，啊，一个男孩出生了，象他那两个哥哥一样，面貌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阔的头额，这就是乳名升馨的李尧棠，后来成为作家的巴金。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此刻，在床帐里，他在想些什么呢？只见他睁开明亮的大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景象，那就是他那温和善良的母亲的形象：她那胖胖圆圆的脸，永远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容，和她用刨花水梳得光滑的头发。她把他紧紧接在温柔的怀抱里。虽然是冬天，人间的母亲的爱，却是这样暖和。

## 第二节 在慈母的抚爱下

显然，母亲并没有辜负“送子娘娘”对她的托付，她本来对这个世界就倾注了热烈的爱，对她自己亲生的几个孩子的爱更是无法形容；而对于尧棠，则就更加爱逾珍宝。李家的长房

住在公馆里的右上房，祖父李镛住的是左上房。尧棠就在那里经常被长辈和下人们怀抱着，从一个人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手里，被爱抚着，因为他当时最小，最受宠爱。他的大哥尧枚比他大七岁，他的另一个哥哥尧林比他大一岁，但他称这个哥哥为三哥，因为那时他的二叔也生了个男孩，比他大两岁，李家是大家庭，按着大排行的规矩，这样，尧林就是老三了。当尧棠自己会走路，虽然总还有大人带领着，但他就再也受不住大人过分的约束，欢喜跟着哥哥、姐姐们去各个屋子串门，特别欢喜穿过大厅和花厅，来到公馆右边的花园里，看重重叠叠的假山，看红红绿绿的花草，看飞来飞去的空中小鸟，和使池塘水面上出现明亮珠子的太阳。可惜的是在他四岁那一年，他不小心跌进在水池里，这事被祖父知道了，立即命人把水池填平。从此，这个花园就再也没有池塘了。

1909年，清朝宣统皇帝接位，尧棠的父亲李道河好不容易获得官府通知，可以到广元当知县。广元在嘉陵江上游，四川省的北边，靠近陕西省，离成都有四百多里路程，是个偏僻的山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对做官的来说，并不是个肥缺。但李道河正在青壮年，血气方刚，觉得有个知县位置，总比闲在大家庭中强，这就鼓起劲头，带着自己家七口人，加上一直服侍妻子的袁嫂，和日常带领尧棠、尧林玩的杨嫂，以及小丫头香儿，老书僮贾福等一行，浩浩荡荡上路。当时从成都到广元，既无铁路，又无公路，只有靠乘船和坐轿。尧棠的母亲生过六个孩子，身体原不很好，这时偏巧又有身孕，沿途照料丈夫和孩子，辛劳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形容的。五岁的尧棠，对这次旅途生活，却感觉到又新鲜又快活，他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高的山，那么宽阔的河面，那么多的树木。大概经过二十

多天的路程，全家才到达了广元县城。

他们一家住进衙门里。那地方比成都老家还大。进去便是一块很大的空地，两面是监牢，零零落落关着一些犯人。接着便是尧棠父亲审判犯人的大堂，然后是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和桑林，以及养鸡放鸭的地方，算起来总共有六、七进。他们住在三堂，和在成都时一样，尧棠和母亲仍睡在一张床上。虽然不久他的第一个妹妹乳名广馨的李琼如出生了，这个妹妹就是至今健在的九姑，巴金同志家里和善可亲的“九姑”。但母亲还是和他睡在一起。每天一早醒来，他就看到母亲圆圆胖胖的脸，总是带着微笑，爱抚着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跟着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到二堂旁边的书房上学，教书的是一位三十多岁年纪的刘先生，人很和善，从不责备他。他先教尧林、尧棠识方块字，后让他们读《三字经》，然后再读《百家姓》和《千字文》。刘先生还能按照书本画出各种人物、山水、花草和房屋。他在孩子们心中是个本领很大的人。他给大哥、二姐、三姐都规定了放学的时间，唯有尧林、尧棠例外，可以早些回家。下午放了学，尧棠总和三哥尧林由丫头香儿带着到四堂后面的草地上去玩。有时他们在桑树上采桑果吃，更多的时候是给公鸡和母鸡起名字，替鸡群排队，做各种游戏。有时看鸡斗，他恨凶狠的霸者，同情受欺压的弱者。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爱的大花鸡没有了，香儿说：“该是太太叫厨房里的何师傅抓去杀了！”尧棠就奔到母亲那边，恳求她不要杀那只鸡，母亲微笑说：“那就叫他们换一只吧。”尧棠说：“这些鸡全是我欢喜的，你就不要杀它们吧。”母亲说：“那不行，是你爹爹吩咐了的。你快到厨房去看一下吧，迟了，那大花鸡便完了。”他又急忙跑到厨房里，果然，何师傅已在揩沾满了鲜血的

刀，那只大花鸡已暈倒在血地里，扑着翅膀咽气了。他大哭着，回到母亲的怀抱里，母亲虽然笑着，喊他“痴儿”，但她并没有责备他，只抚摩着他的头发，给他安慰。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饭桌上端来了一盘鸡肴，别人吃得津津有味，而他却无法下筷。他痴痴地想着：“为什么做了鸡，就得被人杀着吃呢？”

那时节，一到晚上，母亲还给孩子们各人一本用白纸订成的小本子，她每天在这些小本子上，用娟秀的笔迹，端正地抄上一首词，那是按着《白香词谱》的顺序抄录下来的。她柔声地读着这些词句，并为孩子们讲解，让孩子们从幼小的年龄起，就接触到文学和音乐，引导他们的心灵走向艺术的殿堂。尧棠顺应着母亲的吩咐，按日背熟一首词，他当然未必能完全理解这些词的意义，和作者的心情，但他从来不曾因为母亲这样的引导感到痛苦，他总是觉得在母亲身边读诗背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来到广元的第二年，尧棠的第二个妹妹出世了。这是母亲生的第八个孩子，她的乳名叫元馨。这时尧棠早由杨嫂带领着，到另一个房间和三哥尧林同睡在一起。那房间里还有一张床，是杨嫂搬来陪伴他们兄弟两人的。

杨嫂是个二十多岁的寡妇，在成都时就来李家做佣人。她很爱清洁，总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不许孩子们把它们随便弄乱弄脏。她经常半夜起来，为他们两兄弟盖被子；她还会讲故事，虽然内容荒诞离奇，有些不能叫人相信的地方，但还是经常吸引着兄弟俩，听了一个又听一个，成为他们每晚从母亲房间读词回来的余兴节目。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有个晚上，母亲忽然对尧林、尧棠兄弟俩说：

“以后还是让你们的二姐陪伴你们睡吧，杨嫂病了。”说着，母亲和二姐就牵着他们兄弟两人的手来到他们的房间，把他们的床铺安顿好，然后二姐又把杨嫂的床铺换成自己的被褥，伴随着他们躺了下来。二姐尧桢比大哥尧枚只小一岁，比尧棠大六岁，这时已经十二岁，对尧林尧棠说来，是个大姐姐了。她一直很体贴母亲的辛苦，经常帮助母亲料理家务，但她身体很单薄，性情也比较忧郁，经常有点咳嗽，这时母亲也吩咐她早些睡，兄弟俩却要求二姐代替杨嫂讲故事，二姐一口答应着，于是她把白天从《烈女传》中看到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尧棠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他觉得这些故事并不好听。

隔了好久，还看不到杨嫂来陪伴他们，兄弟两人对她非常想念。有一天下午，放了学，尧林对尧棠说：“我们去看杨嫂好吗？”尧棠立刻赞同，两人就悄悄地蹑到三堂右边女佣住的一个房间门口，轻手轻脚地把门推开，只见房间很乱，很暗也很脏，还闻到一股臭气。杨嫂躺在床上睡着，头发蓬松，脸色象一张白纸，桌上放着一碗药还不曾喝掉。尧林轻轻叫道：“杨嫂，杨嫂，我们来看你了！”杨嫂闻声，睁开眼来，见了他们，不觉拉住他们的手，不知是兴奋，还是乏力，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后来她慢慢地问道：“你们好吗？我病倒后，谁来照料你们？”尧林答道：“二姐陪我们睡，还有妈妈……”杨嫂又说：“这就好。我一直惦记你们，怕少了我，你们会吃苦。”她颤着声说完，伸出手去摸尧林的头，却把眼睛望着尧棠。尧棠哭了，他的热泪滴在杨嫂冰冷的手上，却讲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尧林把桌上的那碗药端了起来，说道：“药冷了，我给你拿到厨房去热一下。”杨嫂连忙说：“冷了不要紧，千万不要拿去，给人家增加麻烦。”她把药碗从尧林手上抢了过去，咕噜咕噜地一下就把冰冷的

药汤喝了下去。然后把空碗还给尧林，让他放回桌上，自己就一头倒在枕上，好象做了一件非常吃力的事，疲劳得闭起双眼，发出微弱的呻吟。然后又轻声说道：“你们走罢，让别人见到，会说闲话的。”兄弟俩就走了出来。他们一出房门便见到香儿正在到处找他们。香儿说：“谁让你们来看杨嫂的？她有病，太太知道了要骂你们的……”她果然把这事告诉了尧棠的母亲，但母亲并没有责备他们，只是认真地叮嘱兄弟俩：“今后可再不能去看她了，怕杨嫂的病会传染给你们。”从此，他俩再也不曾看到杨嫂，只听说杨嫂的病愈来愈重了，说她精神有点错乱，嘴里经常念念有词，也不知在说些什么，有时还发出一阵怪声叫喊。有一天，大家正在母亲房间里说着话，香儿忽然进来告诉说：“杨嫂在吃自己身上的虱子呢！她完全疯了！”听到这话，尧棠倒在母亲怀里哭了起来，母亲也叹息道：“杨嫂怎么会生这样的病呢？真可怜，她年纪很轻，就成了寡妇，她的心这样好，她对待你们，和我对待你们差不多，她是从心底里欢喜你们的。她怎么会生这样的病呢？她才二十八岁啊！听人说，杨嫂原有个三岁的孩子，杨嫂每月贴人家一点钱，寄养在乡下，后来不幸掉在河里死了，她连孩子尸首也不曾见到。”过了几天，母亲又说：“看来杨嫂的病不会好了，她连饭都不肯吃，怎么活得长呢？”她征得尧棠父亲的同意，把话吩咐下去：要准备一口棺材，木料要上等的。果然，没有几天，杨嫂就死了，消息传来，全家正在吃饭，父亲不觉放下筷子，母亲流下了眼泪，大哥、三哥、二姐、三姐也都心情黯然，尧棠更推开饭碗，伏在桌上大哭起来。

这是李尧棠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怖和悲哀。当然那时他还不曾体会到杨嫂的死，是有社会原因的；等到十年以后，他

才逐渐理解到那是有一种几千年来就存在着的可怕的封建权势，无形中把这个青年妇女逼疯逼死了。

幼年时代的尧棠在广元县所看到的封建社会，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景象，不仅使他感到恐惧，还使他的母亲感到不安。这就是他的父亲坐在二堂上，拍着惊堂木，审判犯人。说实在，尧棠的父亲李道河平时并不象戏曲舞台上那种鼻子上涂了白粉的好官，当然他也不是旧小说中专替人家伸冤鸣不平的理想人物包公。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对待子女和蔼可亲，但为什么一穿上官服，坐到公案前，脸就沉了下来，俨然变成一个“青天大老爷”，别人都得向他磕头下跪呢！有时父亲命令差役把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最后犯人还得向他三跪九叩，高呼“谢恩”。尧棠站在公案边，常常看得目瞪口呆，在他的脑子里浮现着许多问号，却长期解答不出。但是他父亲还是按着这个规矩，每隔二、三天升一次堂，升堂时总是先问这问那，问到后来，没有办法了，就拍一下惊堂木，厉声高喊：“给我拉下去打！”于是差役们拿起板子，按照他的吩咐，打到犯人身。有时还用一种“跪台盒”的刑罚，把犯人的手、脚、腿都捆在杠杆上，然后使劲抽紧，让犯人感到锥心似的痛，比打板子更可怕。有个晚上，犯人的惨叫让睡在三堂里的尧棠的母亲听见了，她对尧棠的父亲哀求说：“算了吧，人都是父母养的，哪经得起这样折磨？”父亲笑着说：“我何尝欢喜用刑，不过不用刑，他们不肯招，这些犯人很狡猾。”母亲说：“你这样做，不会发生屈打成招的事情吗？”父亲似乎很自信，但又疑虑了一下说：“不会的吧，今后不用死刑就是了。”在他任期内，确实不曾使用过死刑，后来连“跪台盒”的刑罚也不用了，但是还是经常打人板子。有一天，忽然打到管监狱的刘升